

守望 牧職

香港基督徒學會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01

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9樓901室 | 2398-1699 | info@hkci.org.hk / www.hkci.org.hk

第1期2020.4 ■ 督印人：龔立人 ■ 主筆：何嘉衡

初夏至寒冬的香港民主運動及其參與者2019.6 ~

何嘉衡

研究及出版幹事

前言

一定不會有人否認，2019年的香港渡過了讓世人都難以忘記的夏天，無人知道局勢將如何發展下去，能預知香港將會何去何從，也無人能估計香港的抗爭運動將會對整個世界帶來什麼影響。置身於香港回歸以來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為廣泛的社會運動之中的人，不論是積極投入參與活動的抗爭者，或是透過傳媒直播觀看現場情況的市民，都很容易被社會運動以及其瞬息萬變的發展所影響。這一場香港史上持續最長時間的社會運動，自6月便開始的抗爭，當初其實只是因為對香港政府提出對逃犯條例修訂的不信任而引發。因此在最初期，一連串的遊行和集會，普遍只被稱作「反送中運動」。

鳴謝：H，Telegram上營運情緒支援頻道的義工；Raye，前線急救員；D、阿明、雀仔、W，前線抗爭者；KW，家長；鄭樂天、阿希，記者；K，教會資深基督徒；莫慶聯，大學社工教師；Y，牧師；彭牧師；屠城記，前線哨兵。

在盛夏走上街頭의香港人目標非常清晰，就是為了向香港政府展示反對條例的民意，只是6月9日的百萬人遊行當晚，香港政

初夏至寒冬的香港民主運動 及其參與者 2019.6 ~

府馬上就宣佈修訂會如期在立法會二讀，讓不少香港人都悲觀地認為已經再沒有方法可以阻止逃犯條例修訂。不過，2019年下半年的局勢發展，卻讓大多數關注香港局勢的人都跌破眼鏡。香港人並沒有因為香港特區政府拒絕回應訴求以及以鎮壓的方式對待抗爭而退縮，反而是讓抗爭行動在全香港遍地開花，一次又一次的抗爭升級不但沒有造成「民意逆轉」，倒是讓更多香港人繼續支持抗爭運動。除了讓泛民主派於香港區議會選舉取得空前的勝利，更讓香港的事態上升至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的層面。自6月起，原來只是為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起的「反送中運動」，已經儼如「升級」成香港人爭取民主的運動，斷不能只以「反送中」來概括整場運動，畢竟香港政府已在2019年10月23日正式於立法會會議中宣佈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但是抗爭運動並沒有止息，反而在11月發生了震驚全球的警方圍攻大學校園以及隨之而來的激烈攻防。可能因為圍攻大學的事態讓全球震驚，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快速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其後總統特朗普亦簽署法案；及後不少歐美國家國會亦表示會同樣開展相關的討論，香港局勢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

身處前所未有的運動與變局之中，香港人的生活和消費習慣、常識、對生活世界的認知都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因此不只是關注香港事態發展的人希望建構一些理解當前局勢的理論架構，香港人——不論是支持抗爭或是反對抗爭——自身也建構了不少對是次民主運動的理解與想像，每一個人都對是次的民主運動有自己的看法與詮釋。為了更深入了解站於不同位置的參與者他們如何參與在民主運動中，有何考慮、做法以及對將來有何想法，筆者用訪問的方式，接觸超過十五位不同人士，包括記者、牧者、社工、前線急救員，甚至有不同投入程度的抗爭者，嘗試了解他們一手的經驗，對香港這次爭取民主運動的意見與看法，以便勾勒更貼近抗爭的圖畫。

一 | 抗爭帶來的創傷

反送中運動作為香港史無前例的抗爭運動，其中一個讓香港人無法輕易放棄的原因，可以算上這場還未結束的運動之中，已經有為數不少的犧牲者。不僅只有在抗爭中受傷或被捕的抗爭者，還有在抗爭過程中以死明志，或是因為情緒壓力而選擇輕生的人。因此，在運動的早期，抗爭者之間就已經流傳一句出自記錄片《凜冬烈火：烏克蘭自由之戰》(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的話：「若我們現在接受了政府的條件，我們已死去的朋友是不會原諒我們的。」

顯而易見，在抗爭過程中出現死傷者，是其中一個驅使香港抗爭者堅持繼續抗爭的重要理由。不過這種「抗爭中會有死傷者」的氛圍，也使得香港的抗爭運動充斥著讓人感到非常壓抑的情緒。最明顯的例子是在第一位自殺明志的抗爭者梁凌杰出現後，很快便有其他選擇輕生的抗爭者出現，甚至留下希望其他人能夠代為繼續走下去的遺書；也有受訪者向筆者表示知道有抗爭者留書自殺身亡後，都會崩潰大哭超過兩到三小時，完全無法自制，後來發生了其他事情，情況才有好轉。另外，抗爭運動中的死者如港專學生陳彥霖和科大學生周梓樂等，不但將香港市民推向與政府和警隊更為對立的局面，也成為抗爭者的傷痛。其中一位受訪者H，是於Telegram上營運情緒支援頻道的義工，他便表示在周梓樂死訊傳出的那天早上，差不多同一時間有六個抗爭者便因為周梓樂去世而需要在情緒支援頻道上尋求協助。

該位Telegram情緒支援頻道的義工H亦表示，目前他在Telegram上接觸到的抗爭者，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情緒狀況，處於非常壓抑的狀態。特別是當中為數不少的年輕的前線抗爭者，他們很難找到可以傾訴心情和抗爭經歷的對象，因為他們的家人很多都是「藍絲」，也無法確定學校的老師和社工是否能夠信任，故此，他們很

初夏至寒冬的香港民主運動 及其參與者 2019.6 ~

難去找到可以傾訴以紓緩緊張情緒的對象。另外，筆者也接觸過前線的急救員Raye，他認為若有人能夠不帶任何批判，純粹地聽他傾訴所有抗爭過程中的經歷和感受，就已經可以有效地紓緩他的情緒和壓力。可見目前香港非常需要一個能讓抗爭者安全地訴說自己經歷的環境，因為傾訴就已經可以起到一定的情緒紓緩作用。

除了社會氛圍之外，抗爭現場的經歷和見聞，一定是令身處抗爭現場的任何人士出現情緒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抗爭現場猶如戰場，子彈、水砲、暴力等各個因素，都使得每一個曾經身處現場的人，難以回到日常生活之中。

願意接受訪問的前線抗爭者D，自6月12日開始就已經多次參與前線抗爭，雖然他自身本來就已經有一定的情緒狀況，會定期接受輔導，但是這次的抗爭運動明顯對D有非常大的影響和造成一定陰影。他在訪問時表示在6.12的抗爭後，有持續作惡夢，在夢中會不斷重覆看到6.12當日發生過的事情；也會在非抗爭現場持續「聽到」抗爭現場的聲音，如子彈聲和雙方叫罵的聲音。另一個中學生抗爭者也向筆者表示，在參與抗爭後，會常作被警察追趕的惡夢，使他難以好好休息，甚至會影響第二天的上課狀態。參與情緒支援頻道義工H在接受訪問的過程中，也引證了這種無法「回到日常生活」的情況。這是在目前前線抗爭者身上很普遍的現象，他發現不少在Telegram上尋求協助的抗爭者都會向他們詢問在日常生活嗅到催淚彈的味道是否正常；他們聽到巨響會感到非常緊張，出外也會疑神疑鬼擔心自己被跟蹤，也表示會作不同與抗爭相關的惡夢。

除了前線抗爭者，基於不同的理由活躍於抗爭現場的人，例如前線急救員和記者，其實都或多或少會有與抗爭者相似的狀況。急救員Raye是一位除了在7月底至8月初沒有在港，所以沒有身在抗爭現場，在其他時間都有參與抗爭現場提供人道救援工作的大學生，他自8月中後，近乎每一場抗爭行動都有上場參與救援工作，希望可

以在嚴重衝突後，為傷者提供一定的救援。他向筆者表示自己離開抗爭現場，回到日常生活時，會無法進食。Raye在抗爭早期曾出現失眠的狀況，自8月開始變成會作惡夢，甚至會夢見自己被捕。另一位接受訪問的受訪者阿希是記者，曾因工作之故而到前線採訪，雖然他在抗爭現場是完全合法的，不用過分擔心會無故被捕；但是他表示自己也會作惡夢，在夢中被警察追趕，甚至被捕。另外，他也變得非常神經質，風吹過窗戶也會被嚇到。

另一位受訪記者鄭樂天，是白夜媒體的其中一位公民記者。他遭遇到的警暴就更為具體，在一次衝突現場，他正在採訪的時候，前線警員突然將他推跌，在他重新站起來之後，該名將他推跌的警員卻惡人先告狀說他襲警，擾攘一輪後，那名警員才被其他警員勸走。鄭樂天表示，在這次抗爭運動中，他的遭遇已非特例，其他場上的記者，或多或少都曾經遭過不合理的對待。這段時間的採訪也已經對他的生理和心理狀況造成一定的影響，例如有出現類似創傷後壓力症的現象。

從上述各個例子都可以見到曾經身處現場的人多少都會因為抗爭而出現各種不同的壓力反應，甚至出現創傷後的反應；香港社會各界必須要正視相關的情況，保障受影響人士的精神健康。雖然這次運動其中一個最大的影響是讓香港人處於極度高壓及創傷的情緒之中，不過筆者發現部分受訪者卻抱持相當正面的想法，甚至有受訪者認為是今天的抗爭運動改變了他自己的想法，變得相對樂觀積極。

例如上述提及過的受訪者D，他雖然在6月抗爭剛開始的時候，情緒相當不穩定，只要得悉有人輕生就會痛哭，難以自制，（他本人有一定的情緒狀況，需定期接受輔導）。但在8月期間，由於他在社交平台發表的訊息，讓人誤以為他也要輕生，甚至驚動非常多素未謀面的網友四出尋人，他才發現原來自己的消沉會令身邊的人非

初 夏 至 寒 冬 的 香 港 民 主 運 動 及 其 參 與 者 2 0 1 9 . 6 ~

常擔心，讓他開始反思。另外，自6月開始的抗爭運動，讓原本已經對香港社會運動感到悲觀，甚至絕望的D發現，香港還有那麼多人願意堅持，還有那麼多人未「死心」，讓他感到還有希望。在訪問過程中，D坦承曾經計劃過三十歲的時候，就要結束生命，但經過今次的抗爭運動，他的想法反而有所改變。雖然暫時未有長期計劃，D表示希望能與極權政府「鬥長命」，就算不知有生之年能否達成目標，自己仍然會堅持下去。

另一位前線抗爭者阿明，是基督徒，曾經在抗爭現場被捕。在被捕的過程中甚至遭到警方以不合理暴力對待，傷勢嚴重需要送院醫治。筆者原以為被捕與被暴力對待，會讓阿明的情緒不穩，因而在訪問過程相對小心選擇問題。但是他向筆者反映，自己在被警察暴力對待的一刻，其實是很不可思議地感到平安。他笑言當意識到自己應該會被捕，正遭警察打傷頭部和以粗言穢語指罵的一刻，還在心中詢問上帝，自己是不是有向獄友傳福音的呼召；如果有的話，就會承擔這呼召。他表示自己已經「睇得好化」，甚至在訪問中向筆者分析，被捕或是面對警方的「濫暴」最壞的後果就是「死亡」；但是人死後就已經沒有感知，不用特別感到害怕和擔心。而若他沒有因為最壞的後果而死亡的話，活著時最壞的後果，例如面對警察的語言暴力和實質的暴力等，自己也都已經經歷過了，反而沒有那麼害怕再面對警暴。

當然，能像阿明一樣在被捕後仍然保持平安的心境絕非易事，前線抗爭者D的情況也絕非普遍的例子，更多抗爭者卻是因為面對看似絕望的局勢而感到無力與絕望。另外，在抗爭現場實在發生太多超過香港人可以想像的事，一向認為是除暴安良的警隊，卻成為了施暴者，以暴力肆意對待抗爭者。因此Telegram情緒支援頻道的義工H說得很直白，若社會制度不變，再好的情緒支援與輔導也不會有效，因為使得人感到絕望與壓力，甚至帶來創傷的環境和制度根本就沒有任何改變。

另外，由於不少受訪者都是基督徒，部分人在談及傷痛和創傷的時候，都會提到「復和」這很「基督教」的字眼。他們大多希望在未來，香港人與人之間能夠有復和和創傷得醫治的一刻，不過亦同時會指出在今次的事件和運動中，目前最重要的並不是「復和」，又或是最首先要尋求的不是復和；例如受訪記者鄭樂天，他便提到社會一日沒有真相，就不可能有復和，一定要先有真相和公義，社會才能有復和的一日，才可能開始醫治在運動過程中受到的傷痛。另一位教會資深的基督徒會友K也希望教會能夠正視適切當下的「復和神學」，而非空談愛、醫治和復和；因為社會一定要有真相才能彰顯公義，在公義彰顯後才能談及復和與醫治。

香港人對公義有多執著，也許可以從受訪者認為如何能夠紓緩到他們的傷痛和憤怒可以約略一見。例如一位前線勇武抗爭者便說，他因為知道很多被捕手足在被捕後受到的暴力對待，因此感到非常憤怒，同時亦堅定了他繼續在前線抗爭的意志；或許有人能制衡警察的暴力，就能紓緩他的憤怒。前線抗爭者阿明也明確地表示，若香港的法治得以彰顯，警察要為他們的暴力和所作所為負責，就可以有效地紓緩自己在這場運動中的傷痛和不滿；即使他曾經因身在抗爭現場而被捕，但他所期望的不是個人的解放，或是自己能從訴訟中脫身，而是希望公義能在整個香港社會彰顯。記者阿希也在被問到在運動中他的動力為何的時候，回應表示他的動力就是抗爭中見到的不公義，每次見到有人因不公義而受傷、在法庭犯人欄看到的抗爭者，看到一切在香港因為不公義而帶來的問題時，都會成為他的動力。目前開放物業讓有需要的抗爭者可以留宿的家長KW則認為良知是他繼續參與運動的動力，若是能追究、調查和整頓警隊，一定可以紓緩他的情緒以及不滿。

二 | 運動中的激情與理性

雖然從很多報導都可以得悉，現在仍參與抗爭的抗爭者，大

初 夏 至 寒 冬 的 香 港 民 主 運 動 及 其 參 與 者 2 0 1 9 . 6 ~

多是年輕人，甚至有愈來愈年輕的跡象。部分論者或是反對抗爭的人，大多認為年輕人衝動，做事不理後果，橫衝直撞。不過，從筆者所接觸到的受訪者，聽到他們的應對和對抗爭運動的前景所作之分析，筆者並不認為抗爭者只有激情而沒有從理性去分析局勢，他們大多都十分了解當前香港的局勢、自己的限制以及所能做到的事。

明顯的例子有受訪者雀仔及W，他們兩人都是前線抗爭者。在訪問的過程中，雀仔表示自己因故暫時不能再踏上抗爭現場，但是他很快就為自己重新找到參與運動的角色。由於他有一定的人脈，可以幫助有需要的抗爭者尋求法律資源，並且會仔細幫助會到抗爭現場的朋友妥善安排及部署。而W則是在發現自己的身體因為太常留在抗爭現場而出現問題後，不適合再經常活躍於前線，便退下火線組織車隊，為抗爭現場有需要的人提供協助。這兩個人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他們在仍有參與抗爭的時候，每週均會參與抗爭，而且他們在抗爭前線的行動也相對激烈，甚至可能會牽涉一些激烈的抗爭行為。但是會作出激烈行動的抗爭者在知道自己處境和身體狀況後，卻能馬上轉換自己的角色，選擇最適切當時的行動，而非戀戰和被對政權的打壓和暴力沖昏頭腦。

部分年輕受訪者，如已被捕的前線抗爭者阿明，今年二十三歲，在訪問過程中，是處於十分冷靜的狀態與筆者分析他自身的案情和香港抗爭之路的可能發展。阿明在受傷被捕當日，甚至能夠在長時間得不到適切救護的情況下，冷靜應對警方的盤問。記者阿希也是相當年輕的受訪者，今年二十五歲不到，他在向筆者分析運動前景的時候，反而「老氣橫秋」地認為目前的抗爭運動要向整體社會改造方向靠攏；因為抗爭的激情總有一天會消退，抗爭者要以黃色經濟圈的力量改變港人的生活習慣，消費習慣，從而改變香港社會根本的面貌。從年輕受訪者的分享可以得悉，其實他們在面對暴力和不公時，不像大眾認為的只有激情與衝勁，反而他們的選擇和

打算都有經過思考，了解自己正處於甚麼狀態和可以作出怎樣的行動。

另外，這些接受筆者訪問的受訪者，除了前線抗爭者，還有記者、救護員等，基本上所有受訪者其實都十分清楚今次需要面對的，不只是來自警方的暴力和政權的打壓，更多是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當他們被問到如何展望將來的時候，多數受訪者都表示對未來感到悲觀，認為其實香港人沒法作出多大的改變，但與此同時他們大多又認為即使對未來悲觀和充滿無力感，作為香港人的他們仍然需要站出來，為自己和香港的未來奮力一搏。這些看似投身於激情的社會運動之中的受訪者，無論是扮演什麼角色，其實都相當理性地了解自己所對抗的政權是強大的極權政府，它不會願意滿足香港人的訴求；這些受訪者甚至能因為理性分析未來的局勢而對運動發展感到悲觀，但是又會願意繼續投身於抗爭行動之中，或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參與這次的民主運動。

對前景的悲觀與無力，對應抗爭者的積極行動，看似是非常矛盾，但這卻是筆者接觸到的抗爭者，和站於前線參與在運動之中的香港人的普遍想法。他們並非沒有考慮和了解當前香港的形勢，只被運動帶來的激情所推動，相反他們多是已經在思考過後果和當前的局面後仍然選擇行動，連可能需要負上的法律代價和可能面對的刑期都已經考慮過，絕非如部分論者所言，是因為「被洗腦」「衝動」等而輕易作出行動。

例如，筆者亦曾訪問過一位願意開放所住的單位，讓無家可歸的抗爭者可以有安身之處的「家長」。他表示自己在願意開放住宿的同時，其實也已經從法律界朋友口中得悉將可能要面對的法律責任。但是他仍然願意收留年輕的抗爭者，因為他認為讓有需要的年輕人容身之處，不讓他們像廣源邨的年輕抗爭者一樣，被家人不理解而迫上絕路才是他最首要考慮的事。這種得悉行動和實踐會有

初 夏 至 寒 冬 的 香 港 民 主 運 動 及 其 參 與 者 2 0 1 9 . 6 ~

風險，依然選擇繼續行動的做法，絕非筆者接觸到的特例，反而是所有願意接受訪問的受訪者都有的相類似的堅持。例如，另一位在一所宗派教會多年的資深會友K，他在受訪時便曾經向筆者表示他所在的教會，其實十分清楚目前的抗爭有何危險之處，以及教會若支援抗爭可能要面對的打壓。他和教會牧者的處理方法都相當類似，就是游走在教會體制內外之間，以個人身分尋求最大空間以支援目前的抗爭行動和教會中的抗爭者。K這種做法也絕非是在運動中被激情沖昏頭腦，而是了解到自己的角色和可能在運動中做到之事後，冷靜分析與積極實踐之間的結合。

當然，抗爭者在抗爭的過程中，絕非只有理性分析，亦有相當的感性與情緒在主導他們的決定。正如上述提及過前線抗爭者D便認為把他從雨傘運動後，不想再參與任何社會運動的低潮中拉出來的，正正是6月初看到那麼多人願意參與抗爭，讓他發現原來仍有那麼多香港人不願放棄，所以才有動力繼續參與及後的抗爭。受訪者記者阿希則表示，自己曾經有一刻非常想要移民離開香港，但是現在卻會很感性地覺得如果終有一天香港會「死亡」，自己也會願意留在香港。另外，有不少受訪者均向筆者表示，對香港政府的不滿、警隊濫暴的憤怒、對抗爭者處境的同情，亦是他們參與抗爭或支援工作的動力；即使理性上知道很難「戰勝」香港政府以及在後面的極權政府，他們仍然靠著那些已經很難分類的情感，包括憤怒、不捨、不滿等情緒，支撐他們繼續堅持抗爭。

三 | 社會不同位置上的民主運動支援者及參與者

自6月開始反送中運動，讓香港人突然發現原來處於部分組織內，參與社會抗爭，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例如政權可以迫使航空公司不顧專業而辭退已經受過良好訓練的機組人員，為的只是他們曾經有參與過遊行集會，或是在網絡上發表過政權不喜歡言論。另一間香港大型保險公司也傳出會以員工的政見和網絡上發表的言

論來作為辭退員工的根據。一時間人人自危，在這種局勢之中，組織內外各的人有各自的考慮與做法自是理所當然。

在是次訪問的過程中，筆者接觸以不同身分角色參與在社會運動中的人，除了有前線的抗爭者，亦有嘗試在體制內外提供協助和支援的人士，包括社工、教牧和記者。他們各自有自己的職分，有人是正在牧會的主任牧師，有人是獨立於教會外的牧者，有人是離職準備進修的前社工，有人是更多接觸體制內社工的社福界人士，有人是營運新媒體的記者，有人是受雇於傳統傳媒的記者。他們在這次運動中，各自有自己的角色與參與，筆者在訪問過程中，亦有問及他們如何參與在運動之中以及對自己參與的看法。

上述提及過的情緒支援平台的其中一個負責人H，原本是機構社工，因為進修的緣故而辭去原有的工作。他表示目前他不在機構裡工作，反而能夠更誠實地「做自己」，因為在機構和體制內的社工，必然會受到機構方針所制約，或者要在接觸求助者時表現得「政治中立」，不能與求助者同仇敵愾，和表達自己的立場與看法。而且傳統機構的做法很多時追不上時下年青人的生活習慣，例如在年青人習慣於網絡平台上以文字溝通的時代，部分傳統機構還是以電話熱線的方式希望接觸年青人，自然事倍功半。再加上，由於大多社福機構都接受政府資助，很多時候就算機構願意主動提供協助，抗爭者也會因為不信任權威與政府，擔心個人資料和經歷會被轉送到警方手上，而不願向傳統機構求助。H認為目前在體制外進行支援工作，靈活度和行動力遠比體制內的社工來得高，但是沒有固定收入就變成了一個問題，他慶幸自己有一定的儲蓄，尚可應付生活需要。

曾於大學任教多年，培養不少社工的受訪者莫慶聯也提到，目前有不少社工會以私人身分，而非機構身分去作支援行動，如社總和陣地社工的社工們。莫慶聯提到，他們扮演了社工在公民社會

初 夏 至 寒 冬 的 香 港 民 主 運 動 及 其 參 與 者 2 0 1 9 . 6 ~

的角色，而非以機構社工的身分在前線緩和緊張氣氛。但他認為這種做法仍是有問題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社工只是在工餘時間繼續履行社工的工作與責任，社工在公民社會中的角色始終沒有被重視；不過他認同在目前只有公民社會願意自發參與，才能突破傳統非牟利機構力有不逮之處。他也指出傳統的輔導方式，即「求助者尋求幫助，社工或輔導員是專家」的輔導模式，的確不是時下年青人樂於接受的方式；不過在網上社交平台提供情緒支援這種模式也有其限制，因為有些情緒和反應仍然要在面對面的情況下，才能作出適當的判斷和提供適切的支援，所以新模式的網上情緒支援的確重要，但一般的輔導工作仍要繼續並行，才能更為有效地幫助有需要的人士。莫慶聯認為，同仇敵愾的確是其中一種讓尋求支援者覺得好過的做法，但是他亦會質疑這種做法會不會讓社會工作者不夠冷靜客觀，不夠抽離去看待事情。他認為比較理想的做法應該是既要投入，又要抽離，不過他認為在目前的運動中，每個人都不只有一個角色和一種做法，不同的人會可以不同的崗位，去達成自己希望成就的工作。

與社會工作者有類似處境的還有教牧人員，在教會體制裡工作一定會有限制和有顧慮的地方，但是部分教牧人員又卻發現執法不公、禮崩樂壞的社會，並不符合基督教信仰和公義的原則，認為牧者和信徒有責任多走一步，實踐信仰，也有牧者不忍心看到抗爭者面對政權的暴力，所以希望牧者的同在和同行可以為他們帶來一點點的安慰。

願意接受訪問的牧師Y所牧養的教會，在這次運動中亦有一定的參與，不過並非是會讓教會站於風浪中的參與，而是以舉辦法律講座和情緒支援講座等方式，讓會友更能了解到目前在民主運動中的情況，也多次舉辦祈禱會，讓有需要人士可以尋求心靈的平靜。這種參與看似非常「離地」，但是牧師Y所牧養的教會會友，包括年輕的抗爭者，其實都曾向筆者表示他們能夠了解教會的難處，以及十

分感謝牧師Y及教會留有空間，容讓年輕會友能在團契中發聲。牧師Y在訪問中表示教會其實盡可能在不明顯和不犯法的前提下，幫助有需要的年輕會友和抗爭者，牧者和其他導師亦不會批評抗爭者的行為，希望能表達對年輕人的關懷，也開放空間讓會友可以在彼此尊重的情況下溝通並存，而且教會亦會與其所在區內其他教會合作，組織網絡關注區內的抗爭情況及會友。不過牧師Y坦承，體制內的牧者在這次運動中可以作的事不多，因為牧者有職份，所以要小心避免教會被攻擊。

提到避免教會受攻擊，牧師Y牧養之教會的資深會友K就在訪問中更明確地表示，避免教會受到公權力的攻擊和打壓，教會裡任何與抗爭相關，或是可能的支援行為，都不會與體制內的牧者有任何關係，只會由會友自發進行，牧者只是約略知道教會會友有相關的行動，不過實際如何運作、有什麼人受助、有多少人參與等等，牧師都沒有干預，甚至會友也不會主動向教牧人員報告，而是雙方以多年以來的默契和信任，在亂局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以實踐基督教信仰的價值，他甚至笑言體制外的牧者就是為了「牧者擋子彈」的存在。除了會友自發支援社會運動之外，該教會亦有其他不屬體制的牧者，他們相比體制內的牧者，更有空間可以講及更多關於社會與政治的話題，可培養會友思考更多。他認為這些做法是相對安全的，不但可以保障教會和教牧人員，而且教牧本來就沒法處理這次運動中可能出現的所有情況，所以這種分工合作的模式，更適合應對這次運動。除了有為免教會受攻擊而選擇不主動踏足抗爭現場的牧者，當然也有願意站到抗爭現場的牧者，不過以筆者觀察，這些教牧人員大多不是以個別所屬教會的名義站到現場，而是以其他身分，例如「守護孩子」、「教牧關懷團」等組織成員的身分，於現場支援與紓緩緊張的局勢，出現這情況可能與教牧個人的選擇與整體教會組織本來就有別相關，在未得到會友與其他教牧人員的同意下，教牧人員很難以教會的名義踏足現場。

初 夏 至 寒 冬 的 香 港 民 主 運 動 及 其 參 與 者 2 0 1 9 . 6 ~

以體制外的個人身分活躍於抗爭前線的還有彭牧師，他在理大歲年中相對活躍，協助被困理大學生之家長。他表示自己於八月底才回到香港，今年上半年一直身處外地，不過身處外地的他亦非常關心香港的情況。直到他回到香港後，便不自覺地以牧師的身分走到前線，除了觀察和配合自己的神學研究，也是在實踐基督信仰。他認為教會不敢講抗爭，不發出先知的聲音，正是教會影響力下降的原因，甚至會令年青人「用腳投票」，離開教會，反之當牧者願意走到前線發揮影響力，幫助有需要的抗爭者的時候，很多非基督徒都會願意向牧者道謝，認同他們站出來幫助學生的決定。彭牧師認為牧者願意在時代中負擔起自己的責任固然重要，但是他同意牧者要有「獨立自主」的身分才能不受建制的影響，像目前的他本人一樣，正正是不屬於任何體制，才比較容易踏足前線。對他而言，站在前線現場是牧養、宣教與實踐的結合，牧者就是要到前線醫治和安慰受傷的人，所以就算發聲或實踐可能會影響他本來的宣教工作，他仍然願意站出來，與理大學生的家長和留守學生一起同行。

會參與在抗爭現場而又有組織或職分的人，少不免有經常參與在抗爭現場，記錄抗爭運動的記者們，不過相較於社工與教牧，他們在抗爭現場的考慮與參與，就不在擔心是否會影響任職的傳媒，或是如何幫助和面對尋求協助的人士，他們要思考的比較多是在不同的組織內，如何選擇要記錄的畫面和時段。受訪者鄭樂天是記者，目前參與營運一個基督教的新媒體白夜媒體。在自身營運新媒體工作，有時候會協助香港另一家基督教媒體拍攝新聞照片，樂天表示自己半年來基本上都有身處抗爭現場採訪報導。由於他個人可以決定編採重點，所以作為基督徒公民記者，在抗爭現場採訪的時候，他反而不一定會尋找一般人認為重要的新聞畫面，反而會主動找一些很常被其他「行家」忽略的事件，例如在抗爭現場上抗爭者共同進退，市民彼此關顧等畫面，他甚至會認為這些畫面都是上主與人同行的標記，可以安慰和鼓舞所有參與在這場運動之中的人，

希望可以透過記錄和傳播這些故事和畫面，讓人雖身處在相當絕望的處境中，仍能看得到盼望。這種編採的方式，明顯與一般以「點擊率」或「新聞性」為主的傳統媒體有別，所以在網絡社交平台上看到白夜媒體的報導和文章時，往往可見其內容與一般傳媒有別。

另一位受訪者阿希也是記者，他與樂天在受訪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雖然作為記者的他們的而且確有參與在抗爭現場，看似身負很重要的責任，去記錄抗爭現場和向沒在現場的人傳遞資訊，但其實他們都會因為記者的身分而感到無力。因為記者的身分，他們可以站於抗爭現場很前方的位置，甚至可以即時看到衝突畫面，但同樣是礙於記者身分，就算他們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就算看到衝突中不對等的暴力，還是無法做一些認為合理的事，因為記者的職責是記錄而非抗爭，讓他們可以立於抗爭現場而不被視作「犯罪」的原因，正正就是他們的中立與克制，阿希在訪問時便提過希望香港人不要將記者看得太偉大，他們在現場所能做到的事其實不多。鄭樂天在訪問過程中，也有提到記者的職責與見證者的無力之間的拉扯讓他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因為自己在現場的無力和不能作為，會讓他在離開抗爭現場之後感到難過。唯一感到比較好過的是，由於他是在新媒體工作，不一定需要拍攝一般新聞媒體需要的畫面，也可以放下傳統媒體客觀和不介入事件的包袱，主動嘗試在可行的情況下介入事件。例如一次發生在太古城的事件中，一位婆婆在他眼前被警察打倒在地上，表現痛苦，在那一刻他便選擇放棄繼續拍攝同一時間在前方發生的衝突畫面，而是選擇陪伴在婆婆的身邊，以及幫助她打電話找救護車送院求醫。阿希則他說當自己以記者身分處於現場時，最多只能夠查問被捕人士的姓名，盡可能讓他們能夠找到被捕後的法律支援，在訪問中阿希以「紓緩罪疚」來形容自己在衝突現場所做的事，也覺得自己在這次運動中感到受傷害的紓緩方法是看到有其他同路人可以支援到被捕人士，看似以記者身分身處在現場，卻無法完全參與抗爭和支援其他抗爭者，是讓他非常

不安與受傷的事。

從幾位處於不同崗位，有不同角色與顧慮的受訪者的分享可以看出這次民主運動中，有不少人嘗試在自己的崗位中發揮作用，不過每一個人的崗位不同，所需要擔心和顧慮的事不同，所選擇的行動就有所不同。筆者在訪問牧師Y的時候，由於還不了解該教會的情況，其實曾經覺得該教會選擇做的事，實在「離地」，又例如在訪問彭牧師的時候，也覺得選擇在彷如戰場的理大裡向留守者傳福音時很不合時宜的事，但是得悉那些牧者在他們的處境中，已經是在做出自己所能做到最好的事情，就覺得這次運動真的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體制內外的人，都在努力實踐自己所能到的事，或許這也是為什麼香港社會明明已經看似完全失序，政府失卻管治能力，但是民間社會仍能井然有序運作的原因。

四 | 亂世中的基督徒

6月初的反送中運動中，不難看到基督徒的身影，在6.11晚上開始，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突然成為反送中運動早期的抗爭歌曲，引來媒體的注意。一向不滿基督徒的香港網民亦對基督徒改觀，宣稱以後都不會再以具侮辱性質的別稱來稱呼基督徒。不過，自抗爭行動的暴力進一步升級後，在抗爭現場的基督徒看似急劇減少，例如今次其中一名受訪教牧提到自己自7月開始，就甚少踏足抗爭現場；亦有教牧公開表示擔心基督教與基督徒會以極快的速度「墮落」，所以不再支持抗爭者，甚至會反過來支持政府「止暴制亂」。這些說法都好像在擔心甚至引證了香港教會已經不再像6月的時候般勇於參與社會運動，為公義發聲。

6月至今，基督教一直都以相當「分裂」的姿態參與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之中，有一直活躍於前線的教牧，他們踏足各區的前線，希望找到並可以協助有需要人士和緩和抗爭現場的緊張氣氛；也有願

意開放教會與遊行人士，甚或抗爭者休息的教會。但亦有譴責抗爭者的教牧¹，在網絡社交平台亦不難見到部分基督徒責備抗爭者，或為緩和局勢而奔波的教牧和會友。中國官媒在開始留意到基督教的角色後，便高調地以文章來抨擊願意開放教會的堂會²；亦有不少網絡文章將香港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拉上關係，攻擊參與這次民主運動的基督徒，使得部分教會開始噤若寒蟬。到底基督徒有沒有因為抗爭行動升級或基於政權的攻擊而再不支持目前的社會運動？基督教目前以什麼角色參與在香港的民主運動之中，相信也是值得探討和反思的題目。

由於基督新教並非像天主教會，有明顯的「中央」組織，各個宗派教會本身就有不同的神學立場和教導，所以基督新教徒有不同的社會參與及實踐是十分正常的。再加上來自政權的攻擊，使得教會必須小心考慮應如何面對和回應今次民主運動，導致亂世中的基督教和基督徒看似有非常不同的回應與做法。由於是次訪問的對象，為數不少為基督新教信徒，甚至教牧人員，所以在訪問的過程中，筆者也有特別詢問他們如何看待亂世之中的基督徒及教會。

筆者訪問過的前線急救員Raye是基督徒，在訪問過程中，曾經表示對自己的堂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發聲，感到失望，因為他覺得這堂會是自己有歸屬感和喜歡的群體，居然會無動於衷，很難接受。在街坊有需要的時候，卻沒有人願意離開堂會的建築物範圍，為有需要的人作最少的事，例如指路或是開放讓有需要的人進內休息；他對這種不作為感到憤怒，覺得所屬的堂會離地。他甚至認為基督徒的身分會與社會運動有衝突，也沒有基督徒在社會運動中表

1. 警隊基督教以諾團契團牧許淑芬牧師於七月十四日發表〈這是一場與罪犯的鬥智鬥力〉一文，當中便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的行動。

2. 例如有大公報的報導文章〈教會變暴徒私賣 有衫換 有涼沖〉<http://www.takungpao.com.hk/news/232109/2019/1002/356570.html>，擷取自大公網，2019年10月2日，以及中國新風網人民網的〈在香港，這些教會“不”！〉<http://hm.people.com.cn/n1/2019/1108/c42272-31445458.html>，擷取自人民網，2019年11月8日，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直指部分位於「熱門」示威區的教會熱心支援「暴徒」，甚至是「亂港教會」，背後有陰謀等。

初 夏 至 寒 冬 的 香 港 民 主 運 動 及 其 參 與 者 2 0 1 9 . 6 ~

達身分的空間，是故需要放下基督徒的身分才能上到前線。受訪前線勇武抗爭者雀仔其實也是基督徒，他則相對能夠體諒教會沒法走得太前，與Raye相反。以他所知，所屬堂會有一定的政治立場，沒有因為今次民主運動而有太大分裂。從他的訪問中可以了解到，他對所屬堂會有一定的信任，也知道其他會友如何積極參與在運動之中，所以對教會抱持正面的態度。「信二代」受訪者阿希，他接受自己所屬教會在這次運動中表現相對中立，因為堂會和牧者在這次民主運動中願意包容不同的聲音，而且堂會一直以來都有社會實踐，所以讓他知道所屬堂會並非只是離地空談信仰，認為堂會的行動是「不完美，但可接受」。前線哨兵屠城記則是知道自己所屬堂會的傳道人，很多都願意關心和支援抗爭者，亦有會友會參與抗爭，但是會走在抗爭前線的他，往往會處於矛盾的心態，既不希望教會會友踏足危險的地方，又希望他們堅持抗爭。同樣是年輕信徒，這四位受訪者對所屬堂會及會友的觀感實在有非常大的差異。

抗爭中的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別，可能是在於基督徒在接受訪問時，大多表示自己在抗爭中，的確會有一定的底線。例如前線抗爭者阿明就在訪問中提到，他在抗爭過程中，一直都以福音書裡耶穌的選擇與教導為榜樣——「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他說這句話一直提醒他，甚至會影響他在前線抗爭時的行動。另一位前線抗爭者W也提到作為勇武抗爭者，也同時身為基督徒，其實真的會有矛盾，例如他一方面會因看到「獅鳥」行動感到興奮，但是又覺得自己在現場見到「獅鳥」的時候會下意識上前阻止。他認為作為基督徒的自己因信仰的緣故，仍未能決定到可以接受的暴力程度到底到什麼地步，儘管他說已有心理準備，這次的抗爭是一場「戰爭」，「敵人」不會有任何道德底線，可以做出任何超越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行為，甚至認為有人死亡是很正常的事。前線哨兵屠城記也是基督徒，他則向筆者表示，自己選擇在抗爭現場「做哨」是因為哨兵在抗爭中並不會與警察直接衝突，不需要「打人」，既

不會抵觸自己一直以來所相信的基督教倫理，又能幫助到參與抗爭的人。反之，非基督徒受訪者D，在訪問過程便表示自己在抗爭中並沒有任何底線，只會選擇所有自己認為「有效」的抗爭行動，不惜以暴力來實踐，當中包括「獅鳥」和「裝修」。

認為香港教會和基督宗教接下來有很多需要和有可能做到的事，有資深教友K，他說他觀察過自己所在的堂會，在雨傘運動後汲取了當時教會因政見而分裂，以及青年人出走的教訓，遂定下新的牧養方針，以深耕細作的方式保障教會多元與合一。教會內「黃」的一群會友相對於「藍」的一群，私底下更有組織和共同體的感覺；在面對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黃」的會友也更能夠快速地組織和團結起來。但是「藍」的一群會友本來的網絡就比較脆弱，神學基礎也比較薄弱。所以在今次民主運動中，雖然教會不會因為政見而有差別待遇，也會用盡一切方式牧養不同政見的人，但是K和其他教牧人員仍然比較擔心當香港的局勢出現轉變，這些支持政府的藍色群體會情緒崩潰；因此目前教會開始比較留意和思考要如何牧養這群會友。

另外K也與彭牧師一樣，非常重視教會內的神學教導和建構。他分享他所在的堂會一向以「關懷弱勢」作為核心，牧者們亦認同「制度不公」是上帝所不喜悅的，所以願意支援和關心對抗不公義制度的會友和社會上的其他人士。在他眼中，現在香港教會面對的最大問題是在於他們在政治和社會的參與都不足，而那些本來就應該是教會作為社會其中一部分而應該參與的事情，「每次都只付min pay是不足夠的，所以香港教會一直以來都愈欠愈多。」他認為教會只能在參與和幫助社會的過程中，才能了解到目前社會的問題，也才能夠參與解決問題和改善教會的不足。例如教會應該思考和教導社會上的不公義應該要如何解決，也要讓社會體會到被釋放得自由的經驗；還有讓人了解人應該如何面對生命中苦難，教會不能只空談個人的救贖，也絕對不能在面對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時，表示自

初夏至寒冬的香港民主運動 及其參與者 2019.6 ~

己沒有立場，因為立場源自於道德倫理和分辨善惡之心。

從眾多位基督徒受訪者的訪問中可見，其實基督宗教的確有非常多的投入與參與在這次香港爭取民主的運動之中。雖然參與運動的確有可能會帶來後果，例如有神學院的老師與學生被恐嚇，有開放教會的堂會被「黨報」攻擊等，但是好幾位受訪者（包括牧者與平信徒）都表示，在雨傘運動之後，不少教會都有所反思與改變，才能讓基督徒更為關心社會與實踐社會參與，這也正是為什麼基督教會在今次運動有更多投入的原因。

總結

這半年間的抗爭運動無可否認，對香港造成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也對整個世界的國際局勢帶來了非常大的變動，在世界上可能沒有其他地方的政治事件可以吸引全世界的關注及聲援，香港公民社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了香港社會及整個世界。在這場運動之中，實在太多參與者，每一個人都有他們參與抗爭的故事與經驗，實在難以建構單一的論述來了解整場運動。值得注意和觀察的現象，可能已經有很多論者談論過，運動的參與者到底在想什麼，考慮什麼和將會作出什麼行動；但是相對上就比較少人能夠作深入的探問，因為目前的香港並非是一個安全和適合抗爭者分享感受和經驗的地方，很多人只能選擇沉默，避免受到攻擊與清算。

在面對這場前所未有的運動，可以肯定地說，每一個參與者其實都處於探索與摸索的階段，甚至可以說是「見步行步」。例如，在這次訪問過程中可見，有人發現抗爭者需要情緒支援而組織團隊，有人見到社會的公義不彰選擇起來反抗，有人擔心任職的教會被攻擊而私下支持教會會友，有人願意在教會中擔負教導的責任以分散對牧者的攻擊，有人覺得牧者應該站得更前而站到前線，有人覺得記者應該也要放下包袱而盡可能參與和報導抗爭，有人面對暴

力的時候卻抱持前所未有的平安；這些一切都是香港人見步行步後的實踐。解讀和了解這些個人實踐，或許就能約略明白一向被視作「經濟動物」、「冷漠」、「利益至上」的香港人為何能在半年間脫胎換骨，向世人展示香港人爭取自由與民主的決心。這是因為參與抗爭運動的抗爭者，大多都願意不計回報地為香港作出犧牲或貢獻，同時也有各行各業的人們願意堅守自己的崗位，支援願意抗爭的前線；儘管大多數人都對前景不感樂觀，但是他們仍然願意堅持到底。另外，在得悉各受訪者的經驗和他們的看法後，筆者實在認為香港社會能夠面對目前既絕望又看似苦無出路的局面，甚至能在政府管治失能的狀態下，仍能繼續運作，大概是因為香港人本質裡的善良與溫柔，以及對公義公平的堅持。這些堅持和特質，都讓大多數香港人在這半年的苦難中，學會與他者同悲同行，感受他人的痛苦和體諒他人的軟弱，這正正是成就一個共同體的重要特質。

雖然有不少受訪者都擔心這次抗爭的浪潮過去後，香港人會遭遇嚴重的清算，甚至會對未來感到絕望和無力。但筆者在經過今次的訪問後卻覺得，未來不一定如想像中悲觀，因為不少人都在訪問的過程中向筆者展現了他們生命的韌力，還有面對極權的勇氣；即使面對看似絕望的局面，他們還是選擇盡其可能，實踐「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精神。可能是因為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中，有個安全環境，有人願意傾聽他人意見，願意傾聽他人對社會運動的看法，都是不容易的事；所以筆者也沒有預想到這次邀請到的受訪者，往往會與筆者以超過一兩小時來分享他們對目前局勢的看法與自身經驗。但筆者在其後整理和組織訪問稿的時候遇上非常大的困難，礙於篇幅所限，根本無法完整地向讀者呈現眾受訪者的經歷和思考，著實非常慚愧。願香港人在及後的日子中能繼續保有溫柔 and 堅韌的特質，也願公義、榮光歸於這個在苦難中脫胎換骨的香港。

初夏至寒冬的香港民主運動 及其參與者 2019.6 ~

《守望牧職》是新計劃「守望牧職」的其中一種實踐。事緣在「反送中」過程中，學會除了直接參與外，也思考如何支援教牧同工反思他們在社會的角色。就此，我們定下幾個目的：第一，為教牧同工提供對社會事件有厚度的認識，特別是神學和基督徒參與；第二，組織和推動教會與社區對話，甚至尋找合作可能；第三，探討不同教會的社會參與個案，豐富對牧職的想像。《守望牧職》正是以文字來實踐這三個目的。

因疫情緣故，其他實踐計劃將稍後落實。

學會每年財赤達五十萬，但沒有影響我們放慢使命。我們仍努力投入建立一個讓人有尊嚴的社會，並支援教會回應上主的使命。我們需要你們的同行。你們一句打氣的話、一點金錢的捐助是我們動力之一。

捐款方法：

- 劃線支票 — 抬頭「香港基督徒學會有限公司」或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Ltd.

請將劃線支票連同姓名及聯絡方法寄往本會地址，或直接存入支票並通知本會。

- 銀行入賬 — 香港滙豐銀行，戶口號碼：196-035927-001。

請將入數紙連同姓名及聯絡方法透過whatsapp (93520864)、電郵或傳真通知本會。

地址：香港九龍旺角塘尾道54-58號永利工業大廈 9/F 901室

電話：(852) 2398 1699 | 傳真：(852) 2787 4765 | 電郵：info@hkci.org.hk

凡捐款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捐款收據申請減免稅款。



守 望 牧 職

守望
牧職